

洋务运动期间容闳 在上海的企业活动

陈正卿

容闳（1828—1912），广东省珠海市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后归国服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优秀人物之一。他一生活动横跨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几个时期，足迹遍及大洋彼岸、祖国南北，尤其是上海日益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后，他也在上海从事了一系列的企业活动，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笔者谨将历年搜集的这一方面情况作一概述，以供朋友们参考。

一、参预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创建

容闳自185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就立志为祖国献身。但因国内清政府腐败已极，所以又忧心忡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他于1860年春赶到南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旨在改革经济、政治的七条建议，但因洪仁玕等一时无法接受和实行，他怏怏而去，便就转往曾国藩幕下，希望依靠他来实现“富国强兵”抱负。关于这一过程，历来著述中颇有值

得商榷之处。如曾国藩、容闳交往的记始，有人依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认为系容先“多方设法，主动攀上了曾国藩的关系，于1862年夏到达安庆”。①而容闳本人却这样记述，1863年春曾之幕僚张斯桂几次邀请他赴安庆，容闳当时曾忧虑“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后经容闳旧友李善兰附函说明，容方释然前往。《能静居日记》作者赵烈文虽为曾国藩亲信幕门，曾十分赞赏他“留心时事”。但赵于1861年7月才入幕，9月又离去，次年正月再入幕随即就去上海，直至1863年春间才回安庆，並仅一个月就又随曾国荃围攻南京。这一段时间，他基本不在曾国藩身边，所记当系传闻，因此应以容闳自述较为可信。而容闳此时确也不被曾国藩信任，到安庆后数月不予招见，后经李善兰，华衡芳等人竭力引荐曾对容才稍为信任。一月之中召见容闳两次，听容闳讲述关于“制器之器”的见解，十分欣赏，于当天日记就亲笔记下这段议论。正好当年10月，原湘军水师所购七艘兵船全部战毁，曾国藩不得不另谋造船之方，于是便有开设铁厂之议。曾国藩当时命清政府上海道丁日昌在上海虹口（即今九龙路、溧阳路沿江处，收购洋人铁厂一座，以丁督察筹办，並决定派容闳专程往美国购办机器。从此，容闳即与上海江南制造局，甚至与中国近代机械工业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关于此事，曾国藩曾寄函其负责筹款的广东藩台毛寄云说：“查有容委员闳，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派令往西洋购买制器之器”，而其款项，除由上海道丁日昌拨给万金外，其余即由广东藩司衙门“于解皖厘金项下筹拨库平银二万两，交该委员承领，克日驰往采办”。容闳于当年冬天离安庆往上海经

广东，由上海道及广东藩司两处合领银68,000两后，即赶赴美国采办机器。1865年6月容闳购回各类机械一百二十余种，供上海江南制造局收存备用。这批采购到沪的机器总值，据现在保存的由容闳亲笔签署的报销单据计算，除去来往路程费用及一应杂项开支11,900余两外，实际约50,000两左右。关于容闳此项机械装配的厂址，容闳自述《西学东渐记》中亦有误记之处。容闳说：“建立机器厂之地点，旋决定为高昌庙，高昌庙在上海城西北约四英里，即今日所谓江南制造局”。按容闳赴美时，据丁日昌奏称：“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该洋商索值十万元。兹有海关通事唐国华因案革究，赎罪情急，愿集资四万元购成此厂，以赎前愆，”清廷允准。于是此后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都屡次奏报，“查本厂现在虹口，每年房租银约六七千两”。1865年6月容闳购机器回沪，其安装处当在虹口一带。只至1867年夏，李鸿章、丁日昌担心虹口地处“洋泾浜，习俗繁华，厂中工匠众多，时有与洋人口角”，才“请择地移局”于上海高昌庙，占地七十余亩，设立锅炉、机器、熟铁等分厂，开始了国内最早的大工业生产。李鸿章、丁日昌即曾说：“此项所有”制器之器，“逐渐依法仿制”，即可“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从1867年起，江南制造局在生产大量军工产品步枪、子弹的同时，就又生产了机床、起重机、蒸汽机等设备一百余台，对开化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容闳主持的中国近代第一次设备引进活动之前，部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奇工异巧”已有所耳闻，但具体实物只在此后才得以亲见，所以无不心服惊奇。当时上海的一些文人墨客曾在报刊上多次赋诗吟诵，其影响至为深远。1868年容闳离开江南制造局，

在此之前，容闳因看不惯局中官僚的腐朽作风与封建的管理方式，几与当权者齟齬。他从美国归沪后，能留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二三年，主要由于好友、洋务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上海道丁日昌挽留。当时丁日昌即曾致函曾国藩说：“日昌昨奉宫保转传钧谕，令日昌遥领此局，容闳、徐华等亦愿日昌在局中”。后丁日昌去职，容闳即意趣索然，基本不再谋局中事务，将活动方向转往其它方面。江南制造局在李鸿章等人主持下，虽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未起到应有作用，但容闳这一次设备引进活动和他提出的“制器之器”概念，已触到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引进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设备问题，因此被其后的许多进步思想家所重视。如郑观应的“商战”说，就由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能制造“民用机器”为基础。这说明容闳的这一观点影响之深。

二、发起组织华商联设新轮船公司

容闳在对江南制造局的活动兴趣日淡以后，即开始注视国内另一些重要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日益控制中国沿海口岸，亟又阴谋侵夺中国内河航运权。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这种情势日甚一日，岌岌可危。容闳的好友郑观应当时就告诫国人，侵入长江沿线航运的外轮已多达十八九艘，而中国原先的旧沙船业已从3,000多艘一下猛跌到500艘以下，甚至连清政府的漕运也无法维持。容闳对这种趋势极为忧虑，但他又认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土船不如洋船的现实又不能否定，因此，他认为必须集中国内华商财力购买洋船从事航运，与洋商展开竞争，才能

逐步夺回祖国内河航运权。1867年他发起组织华商轮船航运公司，並正式拟定了“联设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商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章程分为十二条，从其内容与文字结构来说，可能是参考了某些国外同类公司章程而起草的。则是容闳在阐述公司发起源由时特别强调，“洋人垄断长江航运，”“对中国商人大有窒碍”，这就说明他力图挽回国家权益的爱国心愿。章程载有容闳的发展计划，他拟先由国内商人集资4,000股，每股100两，共40万两，购买外国蒸汽式洋船两艘，专在长江下游从事上海、镇江间的漕米运输，等业务有了发展，资金有所积累，他再将公司扩充为有2,000吨位的沿海运输船队，从事天津、牛庄、烟台、香港间的运输。容闳对公司的管理体制和形式也有所考虑。他不仅主张公司股权全为华商组成，即连经营管理人员也全部聘用华人。他在章程中规定：“主持公司事务者及其余所有司事人等，亦必须均系有股份者。”实际这就是将公司经营管理大权掌握在华人和与公司有直接利益者结成一体。公司的管理形式也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规定于每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由公司主持人报告经营状况；全体股东评议公司事务，然后当众公布账目，接受监督人员审议，当场按股分红。容闳为使自已这一计划能如愿以偿，除在居沪粤商中积极征求股东外，还通过好友丁日昌事先将这一章程转呈北京总理事务衙门，以求得到清政府批准。而清政府官员中当时分为两派，丁日昌等主张扶持，而另一些大官僚则极为疑虑，担心如由商船承担漕运，万一再发生“民变”，“关系则非浅鲜”。所以当时继丁日昌任上海道的应宝时首先消极抵制说：“恐一时资本难于

募集”，故而竭力主张“洋船只宜官买”，並只能“专为补济漕运之用”。同时，清政府又担忧如批准容闳创办的此类华商船队成立，实际暗中仍操纵在洋商手中，“骗捐取利，不数年即变为洋商，官私利权相窘，种种贻害，莫可究诘”。因此，北京总理事务衙门对此更是讳莫如深。丁日昌为容闳等的创举曾几经辩解，提出购买洋船的华商都须由“该华商出具联环保结，以防弊端，③”但也仍为清政府当权者所否定。实际在清政府这种顽固政策背后的还有洋人，首先就是控制中国海关大权，任江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插手。1863年他就提出了华商制造购买洋船章程六条，对华商进行刁难压制，並从纳税、水手管理、航运业务等方面对华商实行限制。此时，他几次蛮横地上书清政府强调他的主张，这就更使清廷与其地方官府畏之如虎。在这种形势下，容闳的组织华商轮船公司计划则举步维艰，而国内的许多一般民间商人因长期受封建统治束缚，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这一套经营方式本不甚了解，因而此时更观望畏葸者居多，踊跃认购者极少，容闳的计划则停留在纸面上，再一次受挫。但容闳的这一“联设新轮船股份公司”章程，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其影响甚至超出了经济领域之外。公司章程规定的一套西方民主管理形式，对僵化的封建政治体制也是一次冲击。容闳想办新式轮船公司，起因之一也是目睹“运河两岸之居民，大半皆籍运漕为生”，但因“运法不善，遂致弊端百出”。因此，他想用新式运输工具蒸汽船与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体制相结合，来彻底改变旧式漕运落后运输工具与腐败官僚体制相依存的状况。也正因此，他触到了封建当权者的痛处，所以也遭到了他们的扼杀。

三、创办国内最早的华商新闻企业 之一《汇报》

中国自开放门户以来，国内第一家中文报纸《申报》是由英商美查兄弟于1871年5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它发起宗旨虽标榜在“华洋争议中不偏不倚”，但实际言论多倾向于外国侵略者。1874年初，容闳在继协助江南制造局创建、华商轮船公司计划受挫后，认为中国对外交涉屡屡失利，亟需有一“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的言论机构。因此，便由粤籍同乡、好友，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赞助，上海县知县叶颀之首先捐款响应，集资200股，每股50两，共资本10,000两发起组织《汇报》，由容闳主持报务，于同年6月17日首次出刊，比我国第一家华商中文报纸王韬的《循环日报》仅晚五个月。当时《申报》为掩盖其敌意，则假惺惺地表示“本馆于披阅之余，不胜嘉贺。今得雅附同舟，各抒所见，俾阅者得赏心豁目，恢扩见闻，何乐如之”。而殖民主义者控制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则公开干涉，《汇报》成立当晚，按上海商界开张习俗，需鸣放鞭炮志贺，但立即遭到租界当局官员申斥，谓于“夜间喧哗，邻里不安”，令其停止“喧嚷”。第二天，《字林西报》、《申报》等几家外商报纸就幸灾乐祸于重要版面刊出，以便一开始就将《汇报》搞臭。而容闳创办的《汇报》其后也确实与《申报》、《字林西报》为维护中国权益几经论战。其中最突出的有几次，一次是当时上海洋商“越界筑路”风波。上海租界自外国侵略者用武力强占后，租界章程曾规定，外国人只能在租界范围内从事经营、营建

活动。但随着其侵略势力的扩张，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它们所筑的“洋路”便公然延伸到租界外面来。当时上海绅商同起反对，《汇报》也发表社论，指责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绅商利益的损害，要求“立予停止”。而《申报》则以“忘忧馆主”署名发表评论反驳《汇报》，侈谈所谓“筑路十二大利益”，“有利于通商、营运”等等，並指责《汇报》等为“无忧之忧”。实际在当时中国政府无力筑路的历史条件下，赞成其非法的“越界筑路”，为出卖路权。人民的反抗因清政府的懦弱妥协而不了了之，《汇报》无形之中受到打击。此外，同年7月16日，《汇报》为蚕丝、茶叶两项当时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外销途径问题，又与《申报》论战。《汇报》著文主张这些商品宜由华商出口自卖，不必被洋行垄断经营，以免利权漏卮于外人。《申报》则强烈反对，以“中国士商不知外情”为籍口，恐吓华商对于此项主张须“慎之又慎”。经过这几次交锋，《申报》与《汇报》态度更加对立，此时《字林西报》也帮腔一起攻击《汇报》。8月13日，《申报》公然发表评论指责《汇报》，“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之行甫经二月，谬传之事，不止一端”。並抓住《汇报》当时确实存在的一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低级新闻，如“某产妇生子有尾”之类大做文章。实际当时《申报》本身也经常刊登这类低级新闻，而《汇报》刊登此类新闻，则主要为报馆大多数股东全为粤籍中小商人，他们投资报馆一为顾重乡谊，一为由此获利。因此，容闳不得不向他们做些妥协，登载怪异一类新闻以招徕读者。1874年8月25日《汇报》面对《申报》、《字林西报》的攻击，发表《辟字林西报》一文，庄严申明：“本局为中华

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实际，这已是容闳主持的《汇报》对读者的告别辞。9月1日《汇报》股东在外界舆论压力下改组报社，容闳被迫提出辞职。股东会另请英国人葛理母主持报务，《申报》立即表示欢迎，“葛君鸿才硕学，《汇报》之日盛月新，当可操券”。从容闳主持《汇报》首刊到被迫改组，一共只维持了八十一天，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却是重要的。《汇报》因容闳的离去，其言论也改变了原有的性质，最终仍因经营不佳等原因于1875年7月16日停刊。

结 束 语

容闳在上海的企业活动虽不长，並限于历史条件限制，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大。但由于他所进行的活动都具有开创性，所以其意义不可低估。具体的来说，就是两个第一。江南机器制造局的采办机器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设备引进活动，对民族工业的若干特点，即它跳跃了手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大机器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第一，即是他主持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很快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此外，他所创办的《汇报》能旗帜鲜明地高举爱国的大旗，在那个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注：①见《中美关系史论丛》袁洪林著《容闳述论》一文。

②《上海机器制造局若干史实考略》，未刊稿，于醒民著。

③见于《曾国藩未刊函稿》。